学术专论

《四库总目》著录“别本”名义解

李寒光

[摘要]《四库总目》著录图书有四十四种书名中加了“别本”二字，其含义包括同名异书、同书异本两大层面。同名异书“别本”命名的情况包括受内容制约、命名者有意为之或伪书；同书异本的区分标准为内容多寡与版本优劣，或兼及二者，亦有质量相当而仅区分重复者。“正本”“别本”与《四库》抄存并非对应的关系，还有同为抄录书、同为存目书的现象，或虽抄存有别但无关优劣。

[关键词] 《四库总目》 别本 善本观

[中图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3）－03－0107－013

清政府在乾隆年间编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在纂修过程中，为抄入《四库全书》的三千四百多种书，以及约六千八百种存目书撰写了提要，[①]分类汇编为一书，即《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四库总目》或《总目》）。《四库总目》是中国古典目录的集大成之作，其内容丰富，堪称问学津梁、学术门径。全书体大思精、组织严密，部类设置及提要结构均遵循既定条例，即卷首《凡例》。因此，欲探中国之学术，必读《四库总目》，欲读《四库总目》，先通《总目》之《凡例》，《凡例》就是读懂《四库总目》进而窥探治学门径的钥匙。《凡例》曰：“诸书刊写之本不一，谨择其善本录之；增删之本亦不一，谨择其足本录之。”[②]明确规定一书有多个版本，仅据善本或足本著录，不以版本不同而重复立目。这个条例是符合品种目录的著录原则的，特别是纂修《四库全书》之初，发内府所藏及从民间征集来的图书，有大量同书之异本，甚至复本，不可能一一登载。然而，我们发现，在《总目》中，却有数十种图书的书名中被加上了“别本”二字。“别本”就是别有一本之义，最常见的解释就是一书的其他版本。则“别本”书的著录，似与《凡例》相违。

杜泽逊曾就《凡例》之不备者加以补充，指出“凡一书有二本，体例不同或繁简有别，其善本《四库》著录，其别本多入存目”，“别本入于存目者往往是由于内容未为该备、体例未为

[收稿日期] 2022－07－12
[作者简介] 李寒光（1987— ），男，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武汉 430072；hanguang_1987@whu.edu.cn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清代考证笔记研究”（20FZWB013）阶段性成果；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四库总目》著录‘别本’研究”成果。

① 关于《四库全书》的抄书数量以及存目书数量，各阁本及《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不一，今据中华书局影印浙本《四库全书总目》之“出版说明”统计，“收入《四库全书》中的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种”，“存目中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种”。《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65 年，第 3 页。以下引《四库总目》皆据此本，随文括注卷数、页数。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第 17 页。

完善，并非其书全无可取”。① 又说：

> 某些书之“别本”。如《别本干禄字书》《别本潜邱劄记》《别本晏子春秋》之类，均为《存目》之书。所以称“别本”，以别于收入《四库全书》之正本也。凡别本存目者，必于内容或体例与正本有一定差别。完全相同者例不两见。②

交待了“别本”与存目的关系，并说明“别本”的著录标准是“与正本有一定差别”。但其所言并非《四库总目》著录“别本”之全貌，“别本”与“正本”，③“别本”与存目的关系尚有一定的解释空间。

张晓芝在研究《总目》中明别集提要的版本问题时，特别提到有以“别本”著录的版本。认为“‘别本’是馆臣著录文集的一种重要方式”，但“这种著录方法却远没有传统标注版本的方式科学”，对“别本”版本信息的推断，“是没有全面了解明人别集版刻源流的一种无奈之举”，“常常陷入臆断之中”。张书对“别本”问题的讨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归纳了“馆臣采取‘别本著录法’的几条原因”。④ 不过，其研究对象限于明代别集，仅就相关的十篇存目提要展开讨论，尚未全面涉及《总目》著录的全部“别本”。

据中华书局 1965 年影印浙本统计，《总目》著录书名中加了“别本”的著作凡四十四种，⑤ 通过细读“别本”与“正本”的提要，我们认为，“别本”的含义、区分“正本”“别本”的标准较为复杂，有必要详加论证，以补《凡例》之阙。

《四库总目》中的“别本”是一个相对概念，先有“正本”，而后才有“别本”，探讨“别本”的含义，就是要厘清“正本”与“别本”的关系。通过对四十四组提要的分析，我们认为“别本”主要包括同名异书、同书异本两大类情况，每一类又包含多种情况。今不揣浅陋，试论解如下。

一、同名异书

指“正本”和“别本”是作者、内容均不相同的两种著作，因为书名相同，所以在后者书名中加上“别本”以示区分。其实，中国古书中的同名异书现象很多，据《隋书·经籍志》著录，在范晔撰《后汉书》之前，已有八家东汉史，其中，谢承、华峤、谢沈、袁山松的著作都叫《后汉书》。⑥ 杜信孚、赵敏元、毛俊仪尝撰《同名异书汇录》，收同名异书共 13500 余条。⑦《四库总目》中著录的同名异书也不少，有的在书名前加上了作者的字号，以与另一种相区别。如宋代卫湜有《礼记集说》，到了元代，陈澔也作了同名著作。因为陈澔号云庄，所以《总目》将其书著录为“云庄礼记集说”。书名中增以“别本”，也是《总目》区分同名异书的一种方式。

黄威指出：“同一摹状词可用于描述不同书籍的内容属性，是造成同名异书现象的根本原

---

① 杜泽逊：《〈四库全书总目·凡例〉探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3 年第 3 期。

② 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卷首《序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14 页。

③ 之所以有“别本”，是因为在此之前已经著录了一部书名相同或相近的书，杜泽逊称之为“正本”，为《四库》抄录本之义。但实际上“正本”与“别本”并非都是抄录书与存目书的关系，这也是本文所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本文虽然沿用“正本”一词，但不专指《四库》抄录本，而是指先于“别本”著录的书籍版本。

④ 张晓芝：《〈四库全书总目〉明人别集提要研究》第二章“《总目》明人别集提要版本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170–175 页。

⑤ 四十四种不包括《四库总目》卷 50“别史类存目”著录明蒋之翘《晋书别本》一百三十卷，此蒋书原名所有，非四库馆臣所加，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⑥《隋书》卷 33《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 年，第 954 页。

⑦ 杜信孚等：《同名异书汇录》卷首《凡例》，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1 页。

因。"[①] 具体而言，经、史、子、集各部书出现同名现象的主要原因各有差异，但不外乎两种，一是受书籍内容的制约，二是命名者主观选择的结果。

第一种情况，如清初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和黄中的《别本朱子年谱》。为朱熹作年谱者，据杨殿珣《中国历代年谱总录》著录，宋元明三代约有四十家。[②] 其中，有些存在前后承续的关系；有的则偏重不同，或重学术，或重政事；有些则持不同学术观点。《总目》指出，王懋竑所撰《朱子年谱》"取李本、洪本互相参考，根据《语录》《文集》订补舛讹，勒成四卷"，"李本、洪本"分别指明李默的《紫阳文公先生年谱》及洪嘉植的《朱子年谱》。"于学问特详，于政事颇略"，（卷 57，第 517 页）大旨主于朱子学术考证。而黄中《朱子年谱》成书要早于王《谱》，[③]《总目》评价曰："《年谱》中多附以议论，大旨主于颂美，无所考证。"（卷 60，第 545 页）二书虽然都是为朱熹编年谱，都采用了"朱子年谱"这样的通称作书名，但在内容、旨趣上有较大不同。

第二种情况，如明永乐中胡广等奉敕编纂《春秋大全》七十卷，明代后期冯梦龙亦有《春秋大全》三十卷。对后者，《总目》曰："是书虽以《春秋大全》为名，而非永乐中官修之原本。"（卷 30，第 249 页）其实，冯梦龙的著作原名并非《春秋大全》。此书《四库存目标注》仅著录《武英殿第二次书目》进呈本，未见传本。[④]《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均未著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著录明天启五年（1625）刻本，曰：

> 此书实即梦龙撰《春秋衡库》，坊贾为惑人耳目，故篡改书名，以达射利目的。按，据艾思仁告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春秋衡库》（明天启五年叶昆池能远居刻本）与此同版，乃坊贾篡改书名而成。[⑤]

今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北京大学藏《春秋衡库》与中国国家图书馆"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特藏资源"数据库公布冯氏《春秋大全》对照，确为同版，则所谓《春秋大全》，实为书贾伪造而产生的别名，与冯书原名《春秋衡库》形成同书异名关系。《总目》前一种即著录《春秋衡库》，未得其实而接着著录了《春秋大全》。从这个过程来看，《春秋大全》的命名，实有意为之。

又如署名宋濂的《洪武圣政记》与佚名《洪武圣政记》，前书提要曰："是书略仿《贞观政要》之例，标题分记，分严祀事、正大本、肃军政、绝幸位、定民志、新旧俗六类。"（卷 52，第 474 页）据《四库存目标注》著录，明清钞刻本流传至今者甚多。[⑥] 而《别本洪武圣政记》提要曰："其书与宋濂《洪武圣政记》同名，而载至太祖之末，……其文皆钞撮《实录》，别无异闻。"（卷 52，第 476 页）按，宋濂卒于洪武十四年（1381），不及太祖之末。又此书从《太祖实录》抄出，为编年史书，与宋濂之书体裁不同，显然是不同的两种书。书名《洪武圣政记》，大概是抄者有意仿效濂书。这也是同名异书的典型。

《总目》以"别本"区分的同名异书，还有同为抄纂某书而成的不同著作，如《北平录》二种，均一卷，无撰者姓名。《总目》指出二书皆是后人从《明太祖实录》抄出，而所录时间、史事不同。"正本"提要曰："载明洪武三年徐达、李文忠分道出塞追王保保及袭破应昌府事。""别本"则曰："纪明洪武元年命徐达、常遇春等北征之事，而终以君臣鉴戒之语"。（卷

---

① 黄威：《古籍书名考》第九章"古书命名中的特殊现象"，中华书局，2021 年，第 366 页。

② 杨殿珣：《中国历代年谱总录》（增订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142−145、470 页。其中作者所见或友人代阅约 30 种，待访 8 种。

③ 王懋竑生于康熙七年（1668），黄氏《朱子年谱》初刻于康熙十七年，此时王懋竑年仅十岁。王懋竑于乾隆五年（1740）下世，乾隆十六年，其书才有白田草堂刻本。

④ 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卷 6，第 285 页。

⑤ 沈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经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33 页。

⑥ 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卷 16，第 593−594 页。

52，第 475 页）可知它们是由《明太祖实录》衍生出来的两种同名著作。

值得专门一提的是同名异书的伪书。伪书是指一书的真实年代和作者与所标举的不一致。《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伪书,《凡例》曰：

> 《七略》所著古书，既多依托，班固《汉书·艺文志》注可覆按也。迁流洎于明季，讹妄弥增，鱼目混珠，猝难究诘。今一一详核，并斥而存目，兼辨证其非。其有本属伪书，流传已久，或掇拾残剩、真赝相参，历代词人已引为故实，未可概为捐弃，则始录存而辨别之。（卷首，第 19 页）

总的来说,《总目》对伪书持批评态度，但仍以其书质量为审判标准。作为“别本”著录的伪书，与其“正本”是同名异书的关系，包括《家礼仪节》和《别本家礼仪节》、《革朝遗忠录》和《别本革朝遗忠录》、《茶经》和《别本茶经》三组。

《家礼仪节》的两个版本均非善本，第一个版本已有非出自作者邱濬之手的礼图掺入，提要曰“盖又坊刻所窜乱者矣”,（卷 25，第 206 页）不过并未隐没邱濬之姓名；另一个版本则“改题慎名”，成为假托之书。又增“猥琐”之图，是伪中生伪，劣中更劣。所以《总目》斥之曰“真无知坊贾所为矣”,（卷 25，第 207 页）以“别本”下之。《别本革朝遗忠录》也是将原书改头换面而成的一部伪书，只不过此本未标撰人名氏。《别本茶经》是将陆羽之书假托给了“玉茗堂主人”，即汤显祖，又在原书之后，“附《水经》《外集》各一卷”，凑成一种新书。《总目》批评说：“编次无法，疏舛颇多……冗杂颠倒，毫无体例。显祖似不至此，殆庸劣坊贾托名欤？”[①]（卷 116，第 1000 页）

二、同书异本

同书异本指的是同一著作在后世流传的不同版本，一书有多个版本传世，是古书流传的常态。《四库总目》中虽然有大量考订、评论版本的内容，但在全书中所占比重居于少数。正如江曦在《清代版本学史》中指出的：“它毕竟是沿着汉代《七略》《别录》以来的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重点在考订篇卷、阐述内容主旨、评论学术得失，其对后世的影响多在目录学方面。”[②] 以“别本”的方式区分一书之版本，并非《四库总目》之凡例，甚至有违“择其善本”“择其足本”的标准，但在全部四十四种“别本”中，却是所占比重最大的一类情况。

（一）因内容多寡不同而分出“别本”

因内容多寡不同而分出“别本”的，首先是足本与节本的关系。如明陈禹谟撰《经言枝指》一百卷，其中包括“名物考”二十卷。后人将“名物考”刊刻单行，书名作《四书名物考》，共二十四卷。《四书名物考》就是《经言枝指》的一个节录本，所以《总目》称晚出单行者为《别本四书名物考》。与此相类，“别本”为原书节本的还有南怀仁的《坤舆图说》二卷与《别本坤舆外纪》一卷，清王钺的《读书蕞残》三卷与《别本读书蕞残》二卷，宋楼钥的《攻媿集》一百一十二卷与《别本攻媿文集》三十二卷《诗集》十卷，陆九渊的《象山集》二十八卷《外集》四卷附《语录》四卷与《别本象山文集》六卷，元赵孟頫的《松雪斋集》十卷《外集》一卷与《别本松雪斋集》二卷等，这些“别本”都是后人节抄原本而成的，内容远不如“正本”

---

① 《四库全书总目》仅著录“旧本题曰玉茗堂主人阅”，然据《四库存目标注》载，台湾“中央图书馆”藏二部同版明刻本，一题“唐陆羽鸿渐撰，明玉茗堂主人阅”，一题“唐陆羽鸿渐撰，明江夏郑德征君一阅，西瓯陈銮和声订”。（卷 40，第 1770–1771 页）可见，明刻本此书并未伪托“玉茗堂主人”等撰作，而是托为评阅人。但对所附《永经》《外集》二卷而言，则一并假托陆羽。

② 江曦：《清代版本学史》第四章“清中期的版本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23–124 页。

完整。此外，宋周麟之的《海陵集》二十三卷《外集》一卷与《别本海陵集》一卷稍有不同，《总目》曰："此本仅诗六十三首、文四篇，即《外集》一卷。书贾削去标题'外集'字，别作伪帙，以售欺耳。"（卷 174，第 1539 页）即一卷本《海陵集》实为原书《外集》的"别本"，亦可以节本视之。

因内容多寡而以"别本"区分的，还包括初编本与后编本，因为后编本内容多，所以称初编本为"别本"。如明杨士奇在世时自编《东里文集》，仅二十五卷，其中有大量诗文著作并未收入，"后其子孙又刻为续集"，（卷 170，第 1484 页）将士奇删去的篇目又一并刊出，成《东里全集》九十七卷《别集》四卷，比作者最初自编的版本内容大为增多。《总目》以内容多的后编本为"正本"，虽然认为增刻的内容"乃士奇所自芟弃，非尽得意之作"，但"以其搜罗较富，往往有足备考核者，故仍其旧并录之"。（卷 170，第 1484 页）而作者手自编定的初本，则"以不及《全集》之完备，故附存其目焉"，（卷 175，第 1552 页）并在书名前冠以"别本"。类似的还有明罗洪先的《念庵集》二十二卷与《别本罗念庵集》十三卷，石珤的《熊峰集》十卷与《别本熊峰集》四卷两组，只不过它们的初刻本并非作者手订，这是与杨士奇别集的不同之处。

原书编成后复有他人续作，原书既可与续作合为一书流传，又可单独行世，二者相比，有续作的版本内容更多。《总目》中亦有著录合并本为"正本"，而以原书为"别本"的。如宋吕大临撰《考古图》十卷并《释文》，南宋时又有佚名作《续考古图》五卷。清初钱曾《读书敏求记》于原书、续书概称"北宋镂板"，[①] 显误。《四库》即以钱氏述古堂抄本为底本。但宋本无传，难以验证。丁日昌《持静斋书目》著录"宋刊本，宝古堂重修"，曰"此宋刻中无上上品也"。[②] 据范桢考证，宝古堂刻本有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吴万化跋，即钱曾所谓北宋刻本。[③] 所以，目前只能断定最晚至明代，已有合刻本流传。面对所谓的"宋代合刻本"与元刻吕氏原书，《总目》"择足本录之"，而称没有续作的原书为"别本"。元祝明的《声律发蒙》后有潘瑛续撰，合为五卷，在《总目》中，祝氏原书二卷即被称为《别本声律发蒙》，也是此类情况。

由上可知，在面对某书内容多寡不同的两个版本时，《总目》所认定的"正本"一般都是内容较多的那个，反之，内容少的为"别本"。但也有例外，如《潜邱劄记》与《别本潜邱劄记》、《莲洋诗钞》与《别本莲洋集》，均以内容少的版本为"正本"，内容多的反为"别本"，这是以版本优劣为标准而造成的结果，详下文。还有《别本白石词》最为特殊，此书及其"正本"《白石词集》一卷均与《四库》抄录的《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别集》一卷形成节本与足本的关系，即都是《白石道人歌曲》的"别本"。《白石词》一卷收入毛晋《六十名家词》，共三十四阕；《白石词集》一卷为康熙五十三年（1714）陈撰刻本，附于《白石诗集》之后，共五十八阕。而《白石道人歌曲》并《别集》乃据宋板翻刻，所收歌、词、曲共一百零九首。在这三种版本中，《别本白石词》的内容是最少的。所以，此组著作也是因版本内容多寡而区分正别的。

（二）因版本优劣而分出"别本"

一书不同版本内容多寡不同，是最直观的差异，表面看来是《四库总目》区分"正本"与"别本"的一个标准，实际上更是《总目》判定版本优劣的重要依据。在《总目》的话语体系中，内容较多的"正本"的校勘质量也往往比其"别本"更高。如《海叟集》提要曰："此本乃国朝曹炳曾所校，以张本为主，而参以何氏本，正其谬误，较诸本差完善焉。"（卷 169，第

---

① 钱曾撰，管庭芬、章钰校证，傅增湘批注：《藏园批注读书敏求记校证》卷 2 之中，中华书局，2012 年，第 162 页。

② 丁日昌：《持静斋书目》卷 3，中华书局，2012 年，第 257 页。

③ 范桢：《北宋吕大临考古图的版本考察》，《艺术生活——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14 年第 2 期。

1477 页）《别本坤舆外纪》提要曰：“怀仁《坤舆外纪》别有全本，已著录。此本摘录其文，并删其图说，乃丛书之节本，犹明季坊刻窜乱古书之陋习也。”（卷 78，第 680 页）正如张之洞所言，“足本”本来就是评价是否善本的一个重要维度。[①] 所以，《总目》对同种著作区分正别的更重要标准乃是内容之优劣、版本之善否。

因版本优劣而区分“正本”“别本”的，最有代表性的是《干禄字书》与《别本干禄字书》《晏子春秋》与《别本晏子春秋》二组。《干禄字书》提要总结了此书的版本源流，认为清代马曰璐刻本据宋宝祐五年（1257）陈兰孙刻本翻雕，宝祐去唐未远，故底本精良，翻本亦为善本。而所谓的“魏裔介所刊”本，因版本源流不详，且《总目》认为于书眉上误标《广韵》，故而只能算是“别本”。这是从版本源流上比较版本优劣。[②]《晏子春秋》一组则主要依据两个版本的体例加以判断。“正本”为明李氏绵眇阁刻八卷本，其中内篇六卷，外篇二卷，与《汉书·艺文志》合；“别本”为明凌氏朱墨套印本，与李氏刻本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将外篇二卷散入内篇六卷之中，改变了原书的样貌。“正本”提要曰：“若世所传乌程闵氏刻本，以一事而内篇、外篇复见，所记大同小异者，悉移而夹注内篇下，殊为变乱无绪。”（卷 57，第 514 页）“别本”提要亦曰：“乌程闵氏朱墨版以外篇所载已见内篇者，悉移缀其文，附于内篇各条之下，与梅士享所刻《管子》，同一窜乱古书。”（卷 59，第 535 页）可见，《总目》崇尚古本、旧本的思想态度是十分鲜明的。

《四库全书》编纂于乾隆鼎盛时期，主要成于乾嘉考据学家之手，故学术价值、考据资料价值是评判一书优劣的重要标准。对同一种著述而言，前后由不同学者编刻，而编刻者各持学术主张，因此而形成的多个版本便具有了不同的学术价值。或主全面无遗，或主考据辨证，而在《总目》中有“正本”“别本”之分。如《潜邱劄记》和《别本潜邱劄记》。清阎若璩去世后，乾隆九年（1744）其孙阎学林将若璩平日读书札记及序跋、策对、书信、诗作一起刊出，成《潜邱劄记》六卷。但学者以为芜杂，吴玉搢等人屡次删削，抄成了一个新的本子。虽然与原刻本相比，这个本子的内容少了很多，不符合“足本”的标准，但却通过内容的精简，强调了阎若璩作为“考据学家”的身份，符合乾嘉考据学对清初考据学建立的想象。所以，内容多的“原本”反被视作“别本”。[③] 同样不以多为贵，而以精为善的，还有清代吴雯的《莲洋诗钞》。《莲洋诗钞》或《莲洋集》有多个版本，较早的是乾隆十五年刘组曾刻十二卷本《莲洋集选》，《四库》所抄的是乾隆二十九年山东孙谔所刻王士禛评点本，仅有十卷。作为“别本”著录的，则是乾隆三十九年张体乾序刻本，凡二十卷，为传世吴雯诗集中内容最多的一个版本，[④] 故《别本莲洋集》提要云：“三本之中，刘本详备于孙本，此本又详备于刘本。”（卷 183，第 1660 页）《四库》之所以据孙谔刻本抄写，是因为与刘本“无所别择”“颇伤冗滥”相比，孙本更加“简洁”。（卷 173，第 1525 页）张本内容虽多，但《总目》又认为“诗之工拙，不系篇帙之多少”。（卷 183，第 1660 页）

比较数本校勘质量高下而择善者为“正本”，斥不善者为“别本”的，还有《海叟集》与《别本袁海叟诗集》，《彭惠安集》与《别本彭惠安公文集》等，同时，往往又考虑到内容的

---

① 张之洞《輶轩语·语学》：“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阙卷，无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抄。）”见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孙文泱增订：《增订书目答问补正》附三，中华书局，2011 年，第 666–667 页。

② 《总目》于《别本干禄字书》版本鉴定、刊刻者、标韵者、考证者的判定多有疑惑推测之语，对是本的认识与评价并不准确，详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卷 11，第 417–419 页。

③ 关于阎若璩《潜邱劄记》的版本、是书的删定、《四库》本的内容及阎氏考据学家形象的塑造，可参王春伟：《〈潜邱劄记〉版本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 年）、宣燕华《阎若璩〈潜邱劄记〉编刻与流传考略》（《古典文献研究》第 22 辑上卷，2020 年）、李寒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潜邱劄记〉考论》（同上）、李寒光《〈潜邱劄记〉刊刻与删定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2021 年第 3 期）等。

④ 有关吴雯诗集的版本，参见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卷 56，第 3248–3250 页。

多寡。

（三）版本质量相当而仅区分重复

对以上两类“同书异名”的版本著录情况，《总目》大多有较明确的判断。总体而言，“正本”要胜于“别本”。但是，例外的是，在有些提要中，我们读不出孰优孰劣的比较。甚至在《总目》的表达中，“别本”似乎比“正本”更好。我们认为，这些提要中的“别本”，仅是用作区分同一书不同版本的标记的。

如《胡庄肃集》与《别本胡庄肃集》，前者六卷，后者八卷，“别本”提要曰：“与六卷之本稍有增删，而大致相同。”（卷 177，第 1585 页）《别本学文堂集》提要亦云“与前一本大同小异”，又说“疑皆随作随刊之本，非其全帙也”。（卷 183，第 1656 页）《白石山房稿》“正本”十三卷为“振裕督学江南时所刊”，（卷 183，第 1656 页）“别本”二十六卷乃“与刻于江南者大同小异”。（卷 183，第 1657 页）还有《赵浚谷集》与《别本浚谷集》，从提要的陈述来看，前者“诗六卷，文十卷，皆编年而不分体”，后者“诗二卷，赋及杂文十五卷”，又以为后者“《明史·艺文志》载时春集作十七卷，即据此本”，（卷 177，第 1583 页）确实没能比出高低来。实际上，根据当代学者对这两个版本的考证，“正本”为赵时春生前始刻、去世后不久其子增刻而成的，编年而不分体；“别本”是作者之婿周鉴变“正本”编年为分体，且有所选择，“诠次而重刻之大梁”的版本。《四库总目》在“正本”提要中提到的徐阶序，也是为后出的周鉴本而作，后来补刻在前本之首的。[①] 由此看来，“别本”反而有后出转精之妙。不过，《四库总目》的撰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这几组的“正本”与“别本”无论在内容体量上，还是在版本质量上都大同小异，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所谓“别本”，更多的是具有区分重复的标识作用。

而从《洹词》与《洹词别本》一组的提要看来，后者反而看上去略胜一筹。《洹词》提要曰：“皆编年排次，不分体裁。杂著笔记亦参错于其间。”（卷 171，第 1500 页）《洹词别本》十七卷附录四卷，《总目》曰：“是集原本为赵王所刊，仅十二卷。编年排次而不分体。此本乃嘉靖甲寅池州知府周镐命贵池教谕范蕖所重编，始区别体裁，以类汇次，而其文则无所增损焉。”（卷 176，第 1568 页）不过，有趣的是，所谓“无所增损”，并不符合事实，据周国瑞比较，“《洹词别本》同原本相比，不仅‘区别体裁，以类汇次’，而且遗漏或删减了 98 篇文字”，“另有两篇文章，《洹词别本》虽已收入，但目录中却给漏失了”。[②] 从这种认识分析，两个版本互有优劣，《四库总目》的“别本”，仍然只起到区分重复的作用。张晓芝认为：“从馆臣的选择标准来看，别本尚有一些价值，对已著录之本或有补充或有助于探求版本源流。”[③] 从这个意义上看，“别本”的著录，在客观上是有一定意义的，即进一步丰富了《四库总目》的版本目录功能。[④]

（四）因有新辑本而称旧本为“别本”

辑佚古书始于宋代，明人承其绪，在清代达到鼎盛，主要是受了考据学家尊崇汉学的影响，从辑佚汉儒经解之作扩大到辑佚经史子集各类典籍，发展成为专门之学。亡佚之书或有节录不全本，或有不同辑本，相较而言，后出转精。在《四库总目》中，若有新辑本，多以早先节录本或旧辑本为“别本”，新辑本为“正本”。

最常见的是《永乐大典》本。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著录于《四库总目》中的《永乐大典》

---

① 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卷 53，第 2788–2789 页。

② 周国瑞：《〈四库全书总目〉关于〈洹词〉著录中的错误》，《文献》1995 年第 3 期。

③ 张晓芝：《〈四库全书总目〉明人别集提要研究》，第 172 页。

④ 当然，《四库总目》中虽然有很多版本信息，但并非版本目录，著录版本信息并非必须，不能用版本目录的体例来评判《四库总目》的版本学意义。

辑本共516种（包括据《大典》校补之书），其中收入《四库》者388种，存目128种。[1]在本文讨论的四十四组“正本—别本”中，与辑佚有关的共有九组，其中因有《永乐大典》新辑本而称旧本为“别本”的有七组。如汉代卫宏撰《汉旧仪》，本四篇，《隋志》及两《唐志》均著录作四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作三卷，明以后亡佚。被称为“别本”的二卷本，不知辑者名姓，《总目》认为此本有失原书体例，乃“后人从《汉书》注中摘录而成”，且内容前后复见。（卷83，第714页）作为“正本”的《永乐大典》新辑本，虽曰《汉官旧仪》，已非其本名，“而篇目……条系件举，与宏传所云‘西京杂事’相合。又前后《汉书》注中凡引用《汉旧仪》者，并与此卷所载相同，则其为卫氏本书更无疑义”。同时，《四库》馆臣发现《永乐大典》据抄的版本已经“转相传写，节目淆乱，字句舛讹，殆不可读”，于是重新整饬了正文和注文。又从两《汉书》中辑录了不见于《大典》征引的内容，为《补遗》一卷。（卷82，第701页）其他因有《永乐大典》新辑本而将旧辑本称为“别本”的包括类书《实宾录》，以及五种宋人别集：《公是集》《芦川归来集》《文定集》《缘督集》《后乐集》。

在重新辑佚时，《永乐大典》并非唯一来源，旧本也是重要依据与参考。在体例上，或力求旧观，以还原书之貌；或以类区分，使之有体。如《文定集》提要云：

> 今考《永乐大典》所载，为程本不载者几十之四五，盖姚广孝等所据之本即敏政所见之内阁本。而敏政取便钞录，所采太狭，故巨制鸿篇，多所挂漏。谨以浙江所购程本与《永乐大典》互相比较，除其重复，增所未备，勒为二十四卷。（卷158，第1363页）

“程本”就是《别本汪文定集》，为程敏政从内阁藏本中抄出的文本。浙本《提要》于《别本汪文定集》下注“江苏巡抚采进本”，此称“浙江所购程本”，是因为征书时二地均采得其本，《江苏省第一次书目》《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均有记载。又《缘督集》提要云：“今据以增补，乃裒然几还旧观。……今原目不可复睹，谨据所存各体，以类区分。”（卷160，第1376页）所谓“据以增补”，就是据《永乐大典》增补旧辑本。

以上七种《永乐大典》新辑本之外，《尚书大传》《澹轩集》也因有清人新辑本而将旧本称为“别本”。《尚书大传》以孙之騄旧辑三卷本为“别本”，以扬州刻四卷本为“正本”。《总目》认为扬州本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载卷数相合，“校以宋仁宗《洪范政鉴》所引郑注，一一符合，知非依托”。（卷12，第105页）所以《别本尚书大传》提要称“宋本复出”。（卷14，第118页）然而，这种观点并不准确，实际上扬州刻本亦为辑本。先是，卢见曾得旧辑本，刻入《雅雨堂藏书》，并撰《补遗》一卷。卢氏自序曰：“此书元时尚存，前明未闻著录……曩留心访求，近始得之吴中藏书家，……为刊而行之。”[2]《中国古佚书辑本目录解题》著录曰：“卢见曾于吴中访得旧本四卷，不详何人所辑，引文均不注出处，卢氏为之刊行，并撰《补遗》一卷，卢文弨又参孙之騄辑本为《考异》一卷，更辑《续补遗》一卷，并附旧本之后。《四库全书》即用此本而无《考异》及《续补遗》。”[3]因此，《尚书大传》的“正本”与“别本”，也应该是新旧辑本的区分。

《澹轩集》的“正本”为明成化十六年（1480）“山东参政邢居正命青州知府刘时勉裒集遗亡而刊之”的七卷本，（卷175，第1556页）“别本”则是迟凤翔刻八卷本，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该本，其前有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迟氏序，称：

> 偶于历下书肆检得残编一帙，即东藩恭伯邢君所校刻者，嗣是觅其原梓善本，俱已时远无存矣。愚于公之贤裔诸孙曰邑博仲衡、国子生亚衡，暨邑庠生宗儒、宗商者相为友善，乃于家

① 曹书杰：《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1页。

② 卢见曾：《尚书大传序》，见《尚书大传》卷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乾隆二十一年德州卢氏刻《雅雨堂藏书》本，第1a–1b页。

③ 孙启治、陈建华：《中国古佚书辑本目录解题》“经部·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21页。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卷3按曰“《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实即孙本”，第160页。

塾中检得散乱遗稿若干篇，即今目录中注有“续刻”者是也。维时愚适有提督抚治三藩之命，随携此以行，乃于视政暇日，令郧阳府学训导林震、生员秦守卿者重加校阅，合先后所得者厘为八卷，分为四册，付太守张君循募工刻之以传。①

可知，此书“别本”是增补、重刻“正本”而成，时间更晚，内容更多，这与上面所述因有《永乐大典》本而称“别本”的旧本，以及《别本尚书大传》的情况恰好相反。这是因为《澹轩集》的两个辑本都没有抄入《四库全书》，而是同在存目之中，所以此书分“正”“别”，与上文所论“版本质量相当而仅区分重复”相同，而与内容多寡、质量精粗无必然联系。

三、“正本”“别本”与《四库》抄存的关系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初步厘清了在《四库全书总目》的话语体系中，“别本”的几种含义、“别本”不同于“正本”的基本特征以及“别本”之所以称为“别本”的原因。总体而言，“别本”除了最基本的标识书名的作用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即区分两种著作或不同版本的优劣。一般而言，“正本”比“别本”内容或更为完备，或质量更高，或更加可信，这与《四库全书》的抄存标准基本一致。《总目·凡例》曰：

其上者悉登编录，罔致遗珠。其次者亦长短兼胪，见瑕瑜之不掩。其有言非立训、义或违经，则附载其名，兼匡厥谬。至于寻常著述，未越群流，虽咎誉之咸无，要流传之已久，准诸家著录之例，亦并存其目，以备考核。（卷首，第 17 页）

根据我们的统计，“别本”中共有四十二种为存目书，超过“别本”总数的 95%。在全部四十四组著作中，共有二十八、九组“正本”与“别本”正是抄录书与存目书的关系，② 约占全部比重的 65%。显而易见，这些被称为“别本”的著作或版本，多为“寻常著述，未越群流”之类。不过，“正本”“别本”与《四库》书的抄、存并不完全对应，即区分“正”“别”的标准并不全是书籍的优劣，其区分实况也不能与抄录、存目一概而论。除了上述普遍对应关系，我们认为还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一）“正本”“别本”均为《四库》抄录书

“正本”“别本”同时抄入《四库全书》的并不多，仅有《十六国春秋》和《别本十六国春秋》、《原本韩文考异》和《别本韩文考异》两组。

《别本十六国春秋》虽然卷次无多，但《总目》终不能定为伪书，并怀疑是“后人节录鸿书”而成。从这个层面上评判，此书的价值要高于作为“正本”但实为“伪书”的屠本，所以“未能遽废，姑并存之，以备参考”，（卷 66，第 584 页）著录为抄录书。

《原本韩文考异》与《别本韩文考异》实际上是同名异书的关系。前者“体例本但摘正文一二字大书，而所考夹注于下，如陆德明《经典释文》之例，于全集之外别行”。而王伯大重编的后者则是“离析《考异》之文散入本集各句之下”，还在各篇之后附上多位学者的音释，其作者已经不仅仅是朱熹一人，还包括所考异文集的作者韩愈，以及洪兴祖、樊汝霖、孙汝听等人。此二书，前者为朱熹著述原貌，后者便于阅读，并有《经典释文》《史记索隐》体例在先，所以一同抄入《四库全书》。（卷 150，第 1288 页）

---

① 迟凤翔：《续刻马学士澹轩文集序》，见马愉：《马学士文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一年迟凤翔刻本，集部第 32 册，齐鲁书社，1997 年，第 445 页。

② 四十四组中，《别本白石词》所对应的原本有两种，一为抄录书《白石道人歌曲》，一为存目书《白石词集》。若以《白石词集》为正本，则“正本”“别本”均为存目书，构成抄存关系的有二十八组；若以抄录书《白石道人歌曲》为《别本白石词》的“正本”，则构成抄存关系的有二十九组。

（二）"正本""别本"均为《四库》存目书

"正本""别本"在《总目》中皆仅存其目，与前一种情况相比，这类现象明显更多，包括《家礼仪节》和《别本家礼仪节》等十四组。主要是因为《总目》认为原书价值本来就不高，"别本"质量更差。如邱濬的《家礼仪节》，提要曰："是书取世传《朱子家礼》而损益以当时之制，每章之末，又附以余注及考证，已非原本之旧。"又说书上的礼图既非朱熹所作，"亦决非濬之所为，盖又坊刻所窜乱者"。（卷25，第206页）实际上，《总目》著录《家礼》五卷，曰"旧本题宋朱子撰"，已经指出"决非朱子之书"，详礼类杂礼书之属《家礼》提要。（卷22，第180–181页）书贾将邱濬之书改头换面，本来就是以讹传讹，故不抄录。《别本家礼仪节》又假托杨慎，礼图尤其猥琐，更是"无知坊贾所为"，（卷25，第207页）因此，在《总目》看来，此书几乎毫无学术价值，无怪乎被斥入存目。明陈禹谟的《经言枝指》是一部杂抄杂纂而"全无义例"之书；（卷37，第311页）两部《北平录》为同名异书的关系，但均为节抄《明实录》而成；清王钺的《读书蕞残》"跋《汉魏丛书》于真伪多不能辨别"，"袭舛因讹，无所订正"，"惟辨《吴越春秋》及《天禄阁外史》二条，差有考证"，（卷87，第745–746页）在"主于考订异同"（《凡例》，第19页）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当然是下等著作；元祝明撰、潘瑛续撰的《声律发蒙》则直是"为初学发蒙而作，无所当于著述"。（卷137，第1165页）还有明马愉的《澹轩集》、马中锡的《东田漫稿》、胡松的《胡庄肃集》、清陈玉璂的《学文堂集》以及李振裕的《白石山房稿》，其作者本不以诗或文见长，或《总目》认为他们的诗文格调不高，所以"正本""别本"都一并著录到存目中了。

《白石词集》和《别本白石词》是最特殊的一组，与上述诸书不同，姜夔的这两个词集版本均见于存目，并不是因为夔词低劣鄙陋，而是因为此二本均为节钞不全本，而全本《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别集》一卷已经抄入《四库全书》，《总目》曰："此本从宋椠翻刻，最为完善。"（卷198，第1818页）所以我们说，著录于存目中的《白石词集》《别本白石词》均为抄录书《白石道人歌曲》的"别本"。

《洪武圣政记》《革朝遗忠录》及其"别本"也都见录于存目。如前文所述，《洪武圣政记》与《别本洪武圣政记》是同名异书的关系，"别本"节抄《明太祖实录》而成，入存目自不必论。但宋濂《洪武圣政记》似乎可以抄入《四库全书》。《总目》引梅纯《损斋备忘录》曰：

> 本朝文章近臣，在洪武初则学士宋濂，其所记当时盛美，有《洪武圣政记》。自永乐以后，则少师杨士奇有《三朝圣谕录》。至天顺改元，则少保李贤有《天顺日录》《二录》。皆近有印本，而《圣政记》独亡，仅见其序文，惜哉！（卷52，第474页）

可见，此书是当朝文臣记当时事，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且属于稀见文献，在明代已难得一见，自当宝贵，但仍与"别本"一样，仅存其目。今按：《四库全书》于杂史著作抄录甚少，仅著录22部，其中记明事者仅有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朱睦㮮《革除逸史》两种。杂史类存目书共著录179部，大部分是明朝杂史。盖存目之书，或已采入《明史》，或与史传不合，或于考证无补。又因明去清未远，史料既富，即使有真实不诬之作，亦不必一一登录。再加上清代统治者对明人著作的焚毁政策的影响，所以，关于明代史事的书籍，存目的多，而抄入《全书》者少。我们发现，《损斋备忘录》中提到的另外两部著作，即杨士奇的《三朝圣谕录》和李贤的《天顺日录》也是存目书。《天顺日录》提要曰：

> 今观此录，于景帝一则曰荒淫失度，再则曰流于荒淫，毁诋颇为失实。史之所讥，盖即指此。又谓学士王文与太监王诚谋取襄王子为东宫，昌平侯杨洪不急君父之难，当寇薄宣府，惊惶无措，闭门不出，颇与正史不合。至于叶盛、岳正、罗伦诸人之事讳而不言，其他事亦概未纪及，皆未免爱憎之见。（卷53，第476页）

对此书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不过，《天顺日录》入存目的原因，还在于已将李贤的《古穰集》

三十卷抄入《四库全书》，而该书即包含《天顺日录》三卷。提要还特意说："其《天顺日录》有本别行，兹以原本编入集中，仍并录之焉。"（卷 170，第 1487 页）同样性质的明代杂史类著作《革朝遗忠录》与《别本革朝遗忠录》，也因同样的原因而并入存目。

（三）"正本""别本"虽抄存有别但无关优劣

《总目》所著录的"正本"与"别本"，即使明确是抄录书和存目书的关系，但从提要的评价来看，也并不一定是此非彼，优劣分明。

例如孙之騄辑本《尚书大传》，只是因为后来出现了更完备的版本才被称为"别本"，退入存目。《总目》非但没有横加贬斥，反而多有嘉奖，说"之騄于旧帙未出之前，钩稽参考，阅岁月而成是编，其好古之勤，亦不可没"。（卷 14，第 118 页）《别本公是集》也仅仅是因为在其基础上有了内容更全、校勘更精的《永乐大典》辑本而入存目，《总目》特别指出其"较之新喻所刻《三刘集》采摭稍富"，肯定了辑者吴允嘉的搜罗之功。（卷 174，第 1536 页）其他的如《别本汪文定集》《别本缘督集》等，也存在这样的评判倾向。

再如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正本"抄入《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是徐氏原书；"别本"为陈子龙删补本，列在存目。存目提要曰："核其体例，较原书颇为清整。然农圃之事，本为琐屑，不必遽厌其详。而所资在于实用，亦不必以考核典故为优劣。"（卷 102，第 855 页）言外之意，"别本"是非常符合考据学家所推崇的要言不烦、无征不信的治学精神的，只不过考虑到农书的性质与实用价值，才选择将内容更繁琐丰富的原书抄入《四库全书》。《总目》农家类仅著录图书十九部，《农政全书》就占有其二，可见，《四库》馆臣对这个"别本"是持赞赏态度的。[①]

最值得一提的是《别本东里文集》《别本莲洋集》的著录，反映了《四库总目》及存目善本观的矛盾之处。根据前文论述，这两种著作被称为"别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均与"正本"在内容多寡上有明显差异。而其直观不同则是，《别本东里文集》是杨士奇别集的初编本，内容较少；《别本莲洋集》却是作者诗集的后编本，是诸版本中内容最多的一个。在《总目》对版本质量的评价上，它们与"正本"也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抄入《四库全书》的《东里全集》提要引《怀麓堂诗话》曰："杨文贞《东里集》手自选择，刻之广东，为人窜入数首。后其子孙又刻为续集，非公意也。"又曰："续集乃士奇所自芟弃，非尽得意之作。"（卷 170，第 1484 页）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总目》承认作者手订文本的价值，后编本所增加的内容，反而是杨士奇自我删弃的。不过，终因"不及全集之完备，故附存其目焉"。（卷 175，第 1552 页）二者相比，"正本"求全，"别本"求善，《四库全书》选择了全本抄写，"别本"入存目，并未批评，反而希望通过对此本的表彰达到保存其书的目的。《别本莲洋集》的情况恰好相反，《四库全书》选择了一个删定本抄录，而将内容最全的版本著于存目。《总目》已经指出，"诗之工拙，不系篇帙之多少"，（卷 183，第 1660 页）这也是确定二本或抄或存的缘由。但有趣的是，该书"正本""别本"的提要均对王士禛的选评颇有微词。《莲洋诗钞》提要曰："此本沿新城之派，又以神韵婉约为宗，一切激昂沈著之作多见屏斥，反似邻于清弱，亦不足尽其所长。"（卷 173，第 1525 页）《别本莲洋集》亦曰："雯诗足以自传，不以士祯始重也。刻雯集者反若借士祯以传雯，然则使雯不及识士禛，即谓雯诗不工乎？"（卷 183，第 1660 页）言外之意，王士禛的选评，反

① 实际上，《四库总目》对《农政全书》版本的认识有误。据现代学者考证，《农政全书》最早的刻本就是明崇祯间张国维、方岳贡、陈子龙共刻的六十卷本，《四库全书》抄录的"正本"就是经陈子龙删定过的。所谓四十六卷的"别本"，实为六十卷本删去最后《救荒本草》《野菜谱》十四卷而成的一个节本。参考胡道静《关于〈农政全书〉的别本》，《中国农史》1983 年第 1 期，第 96–98 页；吴德铎《关于〈养余月令〉与〈农政全书〉的别本》，《中国农史》1983 年第 3 期；《四库存目标注》卷 35，第 1575–1576 页。本文只讨论《四库总目》著录"正本""别本"所体现出来的善本观，故不在正文中赘述《农政全书》的版本问题。

而削减了吴雯诗风的多样性，使人不得览其全貌。

通过对杨士奇、吴雯诗文集提要的观察，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纂修《四库全书》时多维度的善本观念，以及对一书不同版本抄存选择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是由古书版本的个性特征以及《四库全书》“择其善本”“择其足本”的编纂体例所导致的。弥合矛盾，正是《总目》著录“别本”的一个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结论，《四库总目》著录的四十四种著作书名中所加“别本”，其含义是不同的，最普遍的是某书的不同版本，除此之外，有时还表示同名异书。将“别本”的两层含义区分开来之后，我们细读各书提要，发现一书被称为“别本”的原因十分复杂，内容多寡、版本优劣固然是重要标准，但这两个标准既有重合叠加之处，有时又矛盾互斥。通过对比“正本”“别本”与《四库全书》抄存的关系，我们认识到它们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正本”“别本”同为抄录书，或同为存目书情况的存在，主要由书籍本身的内容价值所决定。但在《总目》的评价话语中，“正本”“别本”也不一定是质量优劣的区别，有时认为二者各有所长，甚至“别本”更胜一筹。由此可见，《总目》著录图书，确实通过“别本”的方式，著录了“于内容或体例与正本有一定差别”[①] 的不同版本。张晓芝说：“从最简单的逻辑出发，馆臣‘别本著录法’是为了将进呈书籍同一人著述不同版本予以关注，否则难与‘全书’之名相称。……从某种程度上说，‘别本著录法’是既不愿遗漏版本文献又不愿违背统治者意愿的这种思想行为转化而成的学术方法。”[②] 放之《总目》著录的全部四十多种“别本”，这种观点是否成立，仍需文献层面的论证。但足以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总目》著录图书的版本学价值。

当然，关于《总目》中的“别本”，还有更多的疑问有待探索、解答。比如“别本”提要与“正本”提要的关系，“别本”提要的辩证——包括在《总目》话语体系中的评价标准、“别本”优劣的客观考察等。另外，本文所讨论的四十四组“正本”“别本”，是以书名中增以“别本”二字的形式明确标记出来的“显性别本”，因为“别本”首先要承担区分相同、相近书名的任务。其实，还有一些“隐性别本”，因为与“正本”书名有明显差别，或在体例上有较大不同，而没有标以“别本”字样。比如本文提到，《四库存目》中连续著录的明冯梦龙的《春秋衡库》和《别本春秋大全》，实为异名之同书，《别本春秋大全》又可称作“别本”《春秋衡库》。李贤的《天顺日录》单行本也因后被编入《古穰集》而见于存目，与《古穰集》中的《天顺日录》也构成“正本”与“别本”的关系，等等。要想更加广泛、深入地理解《总目》著录“别本”的现象与原因，并准确细致地把握《总目》的善本观，需要全面分析各类“别本”的整体情况。此等问题，皆有待再加讨论。

References

Cao Shujie. *Zhongguo guji jiyixue lungao* (A discussion on the colle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Changchun: Dongbe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1998.

Ding Richang. *Chijingzhai shumu* (Bibliography of Chijingzhai).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12.

Du Xinfu, eds. *Tongming yishu huilu* (Catalogue of different books with the same name). Nanjing: Jiangsu guji chubanshe, 2000.

Du Zexun: “Sikuquanshuzongmu fanli tanbu” (Probe and supplement of Sikuquanshuzongmu’s general rules). *Guji zhengli yanjiu xuekan* (Journal of ancient books arrangement and research) 3 (1993).

Du Zexun: *Siku cunmu biaozhu* (Marking of Siku cunmu).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7.

Fanzhen: “Beisong Lü Dalin Kaogutu de banben kaocha” (A study of Kaogutu’s editions written by Lü Dali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Yishu shenghuo: Fuzhou daxue xiamen gongye yishu meishu xueyuan xuebao* (Art life: Journal

① 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卷首《序论》，第 14 页。

② 张晓芝：《〈四库全书总目〉明人别集提要研究》第二章“《总目》明人别集提要版本研究”，第 172–173 页。

of Xiamen Institute of Arts and Crafts, Fuzhou University), 2 (2014).

Hu Daojing: “Guanyu Nongzhengquanshu de bieben” (Another edition of Nongzhengquanshu). *Zhongguo nongshi* (Chinese agricultural history) 1 (1983).

Huang Wei. *Guji shuming kao* (A research on the titles of ancient books).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21.

Jiang Xi. *Qingdai banben xueshi* (A history of edition studies in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13.

Li Hanguang. “Wenyuange Sikuquanshu ben Qianqiuzhaji kaolun” (A study of Qianqiuzhaji in Sikuquanshu collected by Wenyuan pavilion). *Gudian wenxian yanjiu* (Class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22, 1 (2020)

Li Hanguang. *Qianqiuzhaji kanke yu shanding kaolun* (A study on printing and corrections of Qianqiuzhaji). Zhongguo dianji yu wenhua (Chinese classics & culture) 3 (2021).

Qian Zeng, Guan Tingfen, Zhang Yu and Fu Zengxiang. *Cangyuan pizhu Dushuminqiuji jiaozheng* (Dushuminqiujijiaozheng commented by Cangyuan) .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12.

Shen Jin. *Meiguo hafodaxue hafoyanjing tushuguan cang zhongwen shanben shuzhi* (Annotated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rare books in the Harvard – 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U.S.A).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1.

Sun Qizhi and Chen Jianhua. *Zhongguo guyishu jiben mulu jieti* (Catalogue of Chinese ancient lost books).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9.

Wu Deduo. “Guanyu Yangyuyueling yu Nongzhengquanshu de bieben” (Yangyuyueling and another edition of Nongzhengquanshu). *Zhongguo nongshi* (Chinese agricultural history) 3 (1983)

Xuan Yanhua. “Yan Ruoqu Qianqiuzhaji bianke yu liuchuan kaolüe” (A research on compilation, engraving and spreading of Yan Ruoqu’s Qianqiuzhaji). *Gudian wenxian yanjiu* (Class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22. 1 (2020).

Yang Dianxun. *Zhongguo lidai nianpu zonglu* (Chronicles of Chinese dynasties). Beijing: Shumu wenxian chubanshe, 1996.

Zhang Xiaozhi. *Sikuquanshuzongmu mingren bieji tiyao yanjiu* (A study on the Abstracts of collected works of the Ming Dynasty in Sikuquanshuzongmu). Changchun: Jinlin renmin chubanshe, 2018.

Zhou Guorui. “Sikuquanshuzongmu guanyu Huanci zhulu zhong de cuowu” (Mistakes in the description of Huanci in Sikuquanshuzongmu). Wenxian (Literature) 3 (1995).

Explanation of “Other Edition” in Siku Quanshu Zongmu

LI Hangu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hanguang_1987@whu.edu.cn)

Abstract: The word “Other Edition” was written in titles of forty-four books which were registered in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Catalogue* (Sikuquanshuzongmu). The meaning of other edition included different books and different editions. The naming of a “different book” of the same name included being subject to the content, intentionally made by the person who named it, or a pseudo-book; The criteria fo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same book and the different books were the content and the quality of the version, or both, and there were also those of equal quality and on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uplicates. It was uncertain that these other editions were not copied in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Catalogue*.

Keywords: *Sikuquanshuzongmu*, Other Edition, concept of rare editions